



弗洛伊德传

Sigm. Freud

THE
LIFE AND WORK OF

Ernest Jones

Lionel Trilling & Steven Marcus

SIGMUND FREUD

〔英〕厄内斯特·琼斯——原著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史蒂芬·马库斯——编

张洪量——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弗洛伊德传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Ernest Jones
Lionel Trilling & Steven Marcus

〔英〕厄内斯特·琼斯——原著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史蒂芬·马库斯——编
张洪量——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传 / (英) 厄内斯特·琼斯著；张洪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117-3471-6

I. ①弗…

II. ①厄… ②张…

III. ①弗洛伊德 (Freud, Sigmmund 1856-1939) — 传记

IV. ② K835.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565 号

弗洛伊德传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曲建文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538 千字

印 张：32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献给安娜·弗洛伊德
一位永恒父亲的忠实女儿

序

弗洛伊德曾多次强烈反对自己成为传记研究的对象，他给出了若干原因，其中之一是他认为唯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观点——而他的私人生活，他说，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兴趣所在。然而世界的反响却没有支持他的看法。弗洛伊德作为一个个体带着特殊意义站在我们眼前时，可以说现代再没有哪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凭借其不断发展的观点和气质，与他一样光彩夺目了。

究其原因，第一个答案当然在于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价值。精神分析对西方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起初精神分析只是作为应对某种特定的精神类疾病的理论，随后逐渐成为一个有关心灵本身的全新的重要理论。在一切与人类本质及命运相关的智力学科中，没有人能够绕过精神分析的影响。它的概念在大众思想中已经扎稳脚跟，尽管往往有些粗糙甚至有时略显变态，精神分析不仅仅是一个新词汇，更是一种全新的判断模式。对于这位为我们的心理习惯带来如此深刻而普遍改变的人物，我们对他怀有不可抗拒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因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影响了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方式，也是因为这些说法大多都是以一种非常激烈的个人方式被体验到的。

除了天生的好奇心之外，我们对弗洛伊德个人生活的兴趣还有另外一重原因，主要是理性上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学究式的原因。对于弗洛伊德个人历史的讲述可以促进我们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理解。与其他学科一样，如果对其发展史加以仔细研究的话，精神分析学也有着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但是精神分析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它在弗洛伊德个人头脑中成长的历史，因为这个概念完全是由弗洛伊德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否认他的早期助手们的杰出成绩——除了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ph Breuer），他的角色不只是助手而已——但我们可能要说，他们并没有为精神分析理论做出任何本质上的贡献。他们带给弗洛伊德的帮助主要包括对其思想的回应，以及在其知识圈中讨论他的观点和想法并提交临床经验来检验。弗洛伊德不仅是孕育了科学的那个人，同时也是将其发展成熟的

人，这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并非完全是件好事。但这就是事实，重述弗洛伊德的生活，可以使我们对精神分析的概念获得更多亲密认知，这比从它的系统性研究中得到的更多，不论我们研读得多么清楚。而我相信这一点是教育机构进行精神分析训练时惯于恪守的教条。

弗洛伊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值得关注的，还有第三点重要理由，同样也是最令人信服的。在于其生活本身的风格和方式，和我们能在其传奇品格中寻找到的魅力和意义。

这些魅力和意义的一部分，我认为源于弗洛伊德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和谐共鸣。他的工作是宏大的、有序的、果敢而雄心勃勃的；而他的生活也毫不逊色。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难找到这种共鸣。叶芝的一行诗句时常被人引用，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选择完美的工作或完美的生活。”这是一句特别时髦的话。当然叶芝谈论的是诗人，他的意思是，诗人从自己的激情和冲动中获得诗的内涵和风格，而这种情感可能会成为其个人生活的某种障碍；他所说的是道德使命，那种使“生命完善”的强大力量，这是站在文学创作过程的角度来说的。其中蕴含着一些道理——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真谛——我们不必怀疑，但是我们必须留意到如今一种十分奇特的时髦趋势，即将诗人的人生作为所有传记的典范，以及强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之间是如何脱节的，力图在“完美的工作”之中发现“不完美”的生活，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偏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人生则符合了一种老式趣味，它的审美特点是生活与工作和谐共鸣，这种生活从对莎士比亚高尚品格的信念中获得愉悦，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冷静的高贵和美丽中获得欣慰，并为弥尔顿（Milton）笔下的卑劣行径感到沮丧。弗洛伊德本人理想中的生活，就是我们可能会视为古典的那种品质。

在公开宣称自己想当一名英雄之前，弗洛伊德坦然而问心无愧地想要成为一个天才。这与一个事实无疑是相关的，即与他最喜欢的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里的主人公一样，他出生时也伴着胎膜，这是一个预示着命运的记号。他也是那种曾被古怪的陌生人预言将会成为伟人的孩子之一，他们根据他的外表就能未卜先知。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谈及他从母亲的特殊关爱中汲取的不可估量的、甚至是神奇的强大力量——“一个人若始终是其母亲无可争议的最爱的人，那么他一生都会怀有一种征服者的感觉，这种对成功的信心最终往

往会带来真正的成功。”他是七个幸存的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与自己唯一的弟弟相差 10 岁，之间隔了 5 个妹妹——家庭的希望集中在他身上，犹太家庭通常都会对儿子寄予厚望；在维也纳的新犹太家庭里这种期待可能是特别高的。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些挑战，因为这与时代的精神完全一致——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科学和艺术中取得个人成就的那种理想仍然存在，那时候还没有人从准弗洛伊德式的理论中发现“给孩子施加压力”的危险。实现成就的责任来自于家庭和其文化背景的双重压力，同时也被传统教育所要求的道德模式所强化。想要理解弗洛伊德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于欧洲的男孩子们曾有着何种重要意义。虽然作为一名犹太人，弗洛伊德很早就在罗马帝国的伟大将领汉尼拔身上找到了认同，但是他对罗马本身的想象则是众所周知的。他那种孩子气的军事幻想让位于成为文化英雄的雄心；当他梦想着有朝一日他的半身塑像会在大学礼堂里屹立时，他想象中最合适的一句铭文就是《俄底浦斯王》中的那句台词：“解开狮身人面像之谜的人是全知全能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传统又被英语强化——英国是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理性与自由之邦，他常常流露出想要去那里生活的愿望；在他年轻时有段时间他几乎只读英语文章；那时他最喜欢的英语诗人是弥尔顿，他崇拜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还用他的名字为自己的一个儿子取名。在勇敢的英国清教主义与古老的公共美德的共同影响下，弗洛伊德的犹太家庭表现出更为私密但并不那么严苛的道德特点，这种观念也帮助塑造了他关于应当如何生活的观点：过一种严格的、坚韧的、光荣的生活。既然是这样，那么弗洛伊德的临床治疗就会不可避免地指向过分严苛的道德生活所造成的伤害，这实在是一个悖论；而在肯定社会和文化有权对个人提出巨大要求的同时，弗洛伊德也用非常悲伤的目光凝视着痛苦，那些在满足社会要求时必须忍受的痛苦。他对自身的约束是最为严格的，似乎以最为苛刻的性道德来生活，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为一份超越社会容忍限度的“无比自由的性生活”而斗争。

弗洛伊德人生中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他早年的成功梦实现得相对较晚，他非凡的能力直到中年才逐渐显现出来。这在天才传记中不是很常见。弗洛伊德在年轻的时代无疑已经表现出其独特的思维和性格特点，这使得他的朋友和师长们都对他未来的成就抱有较大期望，因为他专业能力十分突出。但是根据弗洛伊德年轻时给出的证据表明，没有人被迫去预言他将来的卓越成就。可以肯定

的是真正的成就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即便弗洛伊德早期科学工作中表现出的最佳状态，也无法与其最终的成就相匹敌。如果我们把伊丽莎白·冯·R小姐（Elisabeth Von R）的案例视为弗洛伊德成就的第一个迹象的话，我们暂且将这个案例的起始日期定为1892年（不太确定），那么使弗洛伊德功成名就的事业便是直到36岁那年才开始起航。

姗姗来迟的成就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弗洛伊德的智性成就有多少需要被同时视作一种道义上的成就。这里有两件不得不说的事。其一是我们必须提到中年人的勇气问题，当他面临家庭的责任，并非常传统地坚信自己必须担负起这份责任时，他为了理论而冒险，提出一种令其职业生涯中所有前辈深恶痛绝的观点。他所谴责的不仅是备受尊敬的道德基石，尽管非常令人信服，同时也是知识的根基——弗洛伊德的观点挑战了德国医学界已取得巨大进展所凭借的科学假设。对赫尔姆霍兹学派的人来说，思想（mind）——不是大脑，也不是神经系统——其本身就是造成自身失调的原因，甚至是身体机能紊乱的原因，这种看法比学术上的异端更为糟糕：这是一种亵渎。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些人的传统中接受了科学训练，他原本被寄予厚望将其装点和继承。事实上他从未完全否定它，因为他肯定它的决定论部分而否定其唯物主义精神，但是他所否定的方面激起了一场愤怒的暴风雨，他用极其从容和冷静的态度直面风暴。通过弗洛伊德成就的道义性质，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他的智力禀赋。对此他从不满意。他想象自己面对上帝时可能会向他抱怨没能给予自己“更好的头脑武装”。他对自身智力特点的评估之一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观察家，不是实验家，也不是思想家。我只是具有一种征服者（conquistador）的气质——如果更通俗易懂一点，就是一个冒险家——充满好奇、大胆，还有属于这类人物的那种韧性。”弗洛伊德对自己智力的低估可能令我们觉得好笑，假如我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可能还会觉得他这是一种虚伪的过度谦虚。然而弗洛伊德描述的正是事实。今天看来，不论他业已成熟的思想可以如何证明他智力上的成就，这些想法在当初刚刚被提出时，他并不觉得这是多么聪明的看法；这种感觉需要相当多的耐心，对事实的绝对忠诚和坚持。骄傲，这个词在其正面的意义上可谓弗洛伊德身上的一种突出气质。但是他在通往最终发现的道路上，走得勇敢而谦逊。科学家确实经常故意谦虚，但事实上弗洛伊德不仅向困难，同时向整个人类奉献了自身。这意味着令人恶心的，或者说遭到道德排斥的，甚至是亲自上阵的那种奉献。这不仅仅是通常

意义上的才智，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当弗洛伊德意识到病人所谓的童年时期遭受的性暴行都是谎言以后，意味着早期他基于这些故事得出的所有理论都必须被丢弃。这是那种能够控制某些事物的才智，超越了对欺骗的愤怒和对前功尽弃的懊恼。他没有去质问为什么所有病人都撒了同样的谎，他决定不去把它称为谎言，而是视作一种幻想，找出其中的原因，并创立了婴儿性欲理论。比才智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了重要分析。

弗洛伊德迟到的起步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我们所发现的大部分传奇品质都是来源于此。因为他充满创造力的时期始于他成熟的岁月，因为他的思想必须慢慢发展，因为他必须保护它们免于世界的敌意，甚至是他的助手们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修正，他的中年生活被赋予一种更为明显的英雄主义力量，和更为明晰的表述能力，比他晚年成熟时期更突出。在中年岁月里，他没有向时间投降，年轻时代的那些冒险和严格要求自己的浪漫情怀丝毫没有减退；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就是这些情怀变得更加激烈和炽热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弗洛伊德感到力不从心，他常常说自己的能力在衰减，他越来越被死亡的问题困扰，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清晰无疑地表达出来了。但是阅读他的书信或详细探索他的生活的人们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的核心能力减少得多么微小，他几乎不允许死亡侵袭自己。不只是因为弗洛伊德70岁时仍然可以在《禁忌、症状和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中对神经症理论进行激进的修正（在美国出版时的题目是论焦虑问题：*The Problem of Anxiety*），更在于他所有人际关系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阶段，包括一个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很难维护好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当桑德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坚持比较弗洛伊德与歌德之间的相似性时，弗洛伊德先是开了个玩笑，然后尖刻地批评了这种比较。但费伦齐的这种比较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准确的，即弗洛伊德与歌德一样，都有能力在青年过后仍然长期保持着一种直接的、健康而富有创造力的兴趣。我们甚至在他疲倦和绝望的表达中也能感受到这种能力。

这一点即使在弗洛伊德晚年时期也未减退，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仍可能充分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与他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这是一个充满悬念的关注。当阅读他早年经历时我们不禁问道：“这个婴儿，这个男孩，这个年轻人，这个家庭的宠儿，真的会变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吗？”而读罢他晚年的叙述时，我们好奇地问：“这个老家伙，这个老人，这个垂死的人，

他还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吗？”他做到了，他的耐力不只体现在生活中，更是在他自己的品质里，这种耐力可以成就个人历史上最令人触动的生活。

晚年生活中弗洛伊德享受着——其实这个词并不恰当——一种远远超过他年轻时梦寐以求的胜利。1919年以后，虽然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攻击尚未停止，但与弗洛伊德理论接受度的日益提高相比，它们的效果要弱得多。弗洛伊德的第70个生日在维也纳公开庆祝，而更多的荣誉接踵而至。弗洛伊德在知识界的声望或许还有些模糊，但已声名远扬。然而他总是干巴巴地说，他几乎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是他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日。尽管他把自己的生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尽管他有着惊人的承受能力，但他长期以来一直以讽刺的眼光看待人类的处境；现在通过一连串事件，人类生存的残酷和非理性本质又以一种全新的可怕力量降临到他身上。

他的两位最杰出的同僚的背叛是这个时期弗洛伊德生活里最突出的重点。他从不轻易背叛，而他与荣格关系的破裂深深地伤害了他的个人感情。尽管早期的分裂已经令双方非常痛苦，但这种分裂是知识事业中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同的气质、文化和智力类型都会催生不同的结论。兰克（Rank）和费伦齐的背叛则是不同的类型。多年里，弗洛伊德都与二人过从甚密，尤其是费伦齐，他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同事，弗洛伊德将他当儿子看待。这些被弗洛伊德寄予厚望的同事们转而对精神分析理论简单粗暴地加以修改，但这不是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分裂还伴随着个性上的深刻障碍，其中费伦齐最终死于发疯。

在弗洛伊德晚年之初，死亡的阴影是沉重的。安东·冯·弗罗因德（Anton von Freund）在经历了漫长而可怕的痛苦后，于1920年死于癌症，他曾通过大量财富来推进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弗洛伊德也深深依恋着他。而几天过后，弗洛伊德收到女儿苏菲（Sophie）的死讯，她年仅26岁，美丽动人，弗洛伊德称她“星期日的孩子”（Sunday Children），苏菲4个月的儿子海因茨（Heinz）于1923年夭折。弗洛伊德对这个小外孙有着特殊的宠爱——他说海因茨对于他来说，比他所有子女和孙子孙女们都重要——他的死亡对他是个可怕的打击。弗洛伊德经历了每一次死亡，他也在其中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他说安东·冯·弗罗因德的死亡是令他衰老的一个重要事件。苏菲的死，他说这是一场“永远无法治愈的深度自恋的伤害”。而小海因茨的死，他认为标志着自己情感生活的终结。

1923年他得知自己患了口腔癌。其间断断续续进行了33次手术，每一次都

足够痛苦，16年里他忍受着极度的病痛维持着生命。他戴的假体又疼又难看，他的脸被扭曲了，说话也不利索，但我们知道，他是个有点爱面子的人。

当然，弗洛伊德也没有宗教信仰来帮助他面对自己的苦难。他也没有“哲学”的酊剂聊以自慰。他和约伯（Job）一样顽固，拒绝言语的慰藉，甚至他更加顽固，因为他不允许自己从抱怨中获得满足。事实正是如此。人生是一份严酷的、非理性的、屈辱的事业——没有什么能缓和这种判断。弗洛伊德仅仅将其视为《伊利亚特》（*Iliad*）本身来过活。

然而，没有什么能摧毁他，没有什么能真正削弱他。他常说他自己日渐疲乏，但他没有。他常说他自己漠不关心，但工作仍在继续。《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这本十分重要的书问世时，弗洛伊德已经73岁。在他83岁去世的那年，他正在写作他的《精神分析纲要》（*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接待患者。

正如他常说的，他可能对自己的生命漠不关心，不关心自己是生是死。但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对自己漠不关心。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英雄式的利己主义正是他道德的秘密。“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当医生做出癌症诊断时，他的朋友们都想要对他隐瞒真相，在他生命最后时日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哭了，眼里燃烧着怒火。他已经很老了，这个故事如今已经覆盖了漫长的岁月，这种善意的欺骗实际上并未在他身上奏效，他瞬间的愤怒是因为朋友们开始怀疑他还能否自主思考，这种想法令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侮辱。我们明白，他的爱的力量源于他的骄傲。当谈起女儿的死亡给他带来的伤害时，他说这是一种“深度自恋的伤害”。他继续说道：“我的妻子和安娜尔（Annerl）所受到的伤害是更人性化的。”这可能暗含某种批评。尽管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但如果他付出爱的方式确实没有其他方式，那么“人性化”，那也是十分迅猛和强烈的。弗洛伊德自身的利己主义使他认识并尊重他人的利己主义。在他深感疲惫、不堪重负之时，吸引他给那些陌生人回信的是何种力量？——例如用英文写一封长信，对一位深受儿子同性恋事实困扰的美国女人给予如此严肃的关注。

经历了多年来的巨大痛苦——生命将尽，弗洛伊德说他的世界是“一座充满苦痛的孤岛——漂浮在一片冷漠疏离的海上”——他没有服用任何止痛药，直到最后他才同意服用阿司匹林。他说他宁愿在痛苦中思考，但不能不保持清晰的头脑。只有当他确信，他的肉身已经失去他的心灵时，他才要求使用帮助他安然死

去的镇静剂。

弗洛伊德认为厄内斯特·琼斯（Ernst Jones）是自己命中注定的、极其合适的传记作者。我们不能预见，在漫长的时光中还会有什么其他关于弗洛伊德的故事被写下，但我们相信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借鉴琼斯医生这部权威和不朽的著作。琼斯医生有其独特的优势足以应对这项艰巨使命，这几乎不需要解释。他与弗洛伊德交往了31年。他在美洲大陆和英国地区的精神分析创立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弗洛伊德生前，为了保证他死后，那些他最为欣赏和信任的同事们仍然能够围绕精神分析事业共同合作，他创办了著名的“委员会”（Committee），琼斯医生是其中最聪明最富判断力的两三个人之一。他致力于精神分析——正如这个字眼本身的意思——在最正统的路径上发展它，他发现在责任心的强化下，他可以就与某些理论相关的事件与弗洛伊德进行讨论。他自身的显赫地位使其能够以一种深情而客观的视角看待弗洛伊德，同时笔下也流露出他自己的极大钦佩。他在许多领域里的知识储备都令他游刃有余，此外他的散文风格生动而明晰。

在个性的某些方面，琼斯医生与弗洛伊德很是相像。他没有也不渴望拥有弗洛伊德的那种宏伟的知识储备；他是极其善变的。但是他与弗洛伊德都拥有巨大的能量，尽管二人的能量风格不同，而且在琼斯医生那部记录个人成就及自身生活的未完成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极富创造力的自我，还有他对英雄式的坚韧和成就的欲望是何等强大。

琼斯医生非凡的个人才能我曾有过直接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百年诞辰之际他最后一次访问美国，同意为电视台录制一部影片，我被请去做他的谈话人。这部片子现在剪辑出来已经不到半小时了，但原始录像带长达好几英尺，拍摄了三天。那些天的工作任务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得多。在5月的炎热的一天，琼斯医生和我坐在精神分析研究所（Psychoanalytic Institute）图书馆的桌子前谈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琼斯医生本人的生活，灯光、摄像机、制片人、道具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摆放我桌子上那个烟灰缸）、带妆的男人、电工，在片场里，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当时琼斯医生已经78岁了。就在他飞往纽约的前几天，他刚刚做完一场大型癌症手术出院，在飞行途中他还出现了大出血。然而琼斯医生看上去十分镇

静，不知疲倦。在我们开工的第一天，中午剧组为他提供了午休时间，让他回到房间休息，他的医生舒尔（Schur）大夫也来了，后者也曾在弗洛伊德的最后几年里担任他的医生。我试图拒绝加入他们的聊天邀请，我想他可能需要小憩一下，或者至少不能一直说话。但这跟琼斯医生的想法刚好相反。舒尔医生是他的老朋友，而我高兴地发现，我正在成为他的新朋友。琼斯医生显然认为，谈话才是此情此景最该做的事。他还是同意躺下了，但是他一直与我和舒尔医生热情攀谈，直到下午重新开始工作。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对着镜头发表一段清晰机智的即兴演讲是相当困难的。但琼斯医生则丝毫不这样；不论应对什么话题，他都能给出一段清晰、直观、具有说服力的完美陈述，并且似乎丝毫不费力；他只谈那些他知道并相信的东西，很显然他喜欢这样做。在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琼斯医生都高高兴兴地前去出席所有等待着他的社交活动，我疲倦而僵直地望着他走远，心想我一定是认识了某个巨人种族的幸存者。

在琼斯的美国出版商的邀请下，马库斯先生（Mr.Marcus）和我着手将原来卷帙浩繁的三大卷，精简到一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版本，我想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我们的肩上是一份多么精细的任务。但是我们相信这本书将会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缩短原文的长度，同时确保不限制其范围或是删减其材料和架构，我们认为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某些部分的删减可以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琼斯医生记录了他的陈述并透彻地给出了各种出处；但普通读者并不需要他提供的众多学术著述。毫无疑问，外科医生对弗洛伊德下颤动过的所有手术记录都是可以保存的，但大多数读者对此也不感兴趣。就其本身而言，琼斯医生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萌发到放弃的整个过程的记录是相当有趣的，然而他的那些概括说明，读者已经可以从前面的叙述中看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原始版本的第二卷中有近 170 多页都是琼斯医生对弗洛伊德 1919 年全部工作所做的总结和评论；但出于他的写作意图，这些篇幅使他对弗洛伊德科学工作中的某些情节段落做了一些更为经济的调整，我们保留了这份调查中的一些篇幅，将其转移到传记叙事的合适部分。原版第三卷中有近 200 页的“历史回顾”，梳理了弗洛伊德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些篇幅固然很有意思，但事实上光是它们自己就可以独立了，有一些确确实实是与弗洛伊德的研究相关的，但对于理解他的生活和性格并不是很必要。这里我们保留了某些段落，并运用它们使得部分叙述更加明确。弗洛伊德的书信也总是相当有

趣，但我们认为，那些全部或部分附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后面的复印件并不能算是整个传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原来的版本中，这些书信中的致敬和结语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如果不是特别有必要的，其他的我们都删掉了。我们保留了琼斯医生的部分脚注，一些提供了必要解释，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也都删除了。

做出类似的决定并不困难。当然真正的困难在于处理文本本身。本书当中异常丰厚的材料使我们安心，而且我们也意识到琼斯医生需要处理的材料，比他写作所需要的多得多。除了他自己对弗洛伊德的了解，弗洛伊德一生中的大事件，以及“精神分析运动”的形成，以及它背后的这位伟大人物的人格特征等等，还有大量细节资料涌向他，因为他是“官方”的完全可信的传记作者。弗洛伊德的家人、朋友、同事们的个人回忆录、信件和其他文件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规模。（据琼斯医生的儿子记载，当弗洛伊德的遗孀死后，满箱的信件被发现，琼斯把传记第一章几乎是全部重写了一遍。）在这样的情况下，传记作者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一种天然的虔诚使他试图将每一个信息都保存下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展示一些可用的证据，或者还要讨论一下它们的利弊。举一个例子：在早期的叙述中有几次琼斯医生都引用了弗洛伊德一个妹妹的回忆，而他几乎每次都得出结论：她的记忆肯定是错的。我们认为，弗洛伊德妹妹的回忆——无论对与错，包括琼斯医生为什么认为它是错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总的来说，只要在我们看来，琼斯医生将管理员的职责附加于传记作者的身上时，我们就会想办法减轻他的负担，以便他作为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的水平得以更加生动活泼地呈现给读者。

只有这样，规则才会指引我们走得更远。马库斯先生和我凭借着我们不佳的文学技巧，和对琼斯医生及其著作的敬重，以及我们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思想的浓厚兴趣，完成了接下来的编辑工作。我们的方法是密切地讨论与合作。我们每个人分别阅读这些章节，分别标记我们认为可以删掉或保留的部分。接着我们一同阅读，比较我们各自建议删减的段落，通常总会滔滔不绝地讨论一番；我们的规则是遇到意见分歧，就先保留问题。在一些被我们删除的地方还添加了一些必要的转换，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些部分承袭了琼斯医生本人的文风。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前 言

写作这本书的意图，并不是想让它成为弗洛伊德的畅销传记，市面上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其中夹杂着对事实的严重扭曲和大量不真实的信息。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记录弗洛伊德生活的主要事实，趁着我们还能知道——说得更有抱负一点——还试图把他的个性和人生经历与其思想发展联系起来。这不是一本会获得弗洛伊德本人批准的书。他觉得自己已经在著作中的许多段落里，透露了足够多的私人生活信息了——对此他后来确实后悔过——他有权保留私人生活；世界应该继续使用他所贡献的知识，而忘记他个性上的东西。但是他对自我揭露的忏悔来得太迟了。居心不良的人们已经开始忙于断章取义地诋毁他的人格，所以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对他的内在世界和外在生活进行一次更为完整的阐释，才能纠正那些错误的说法。弗洛伊德家人们对他保留隐私的愿望表示理解和尊重，并且确实做到了。他们经常庇护着他，不让他成为公众好奇的焦点。然而，越来越多从来不认识弗洛伊德的人编造了许多虚假故事，故事逐渐累积成一个虚构的传奇，这些消息改变了弗洛伊德家人们的态度。于是他们决定给予我全心全意的支持和信任，在我的努力下，我将尽我所能地记录和呈现弗洛伊德生活的真实面貌。

人们可能普遍认为，伟大的人物因其地位显赫而丧失了在公众生活以外拥有私人道德的特权；通常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他们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同样具有价值。弗洛伊德自己也经常对那些在伟人生活中没有被记载的细节表示遗憾，它们都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如果弗洛伊德没有他自己的天地，对世界来说是个很大损失。他呈现给世界的并不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心灵理论，不是一个可以不必参考作者便能随意讨论的哲学命题，而是一场逐步打开的探视，我们的视线会偶尔模糊，有时又能清晰起来。他所揭示的洞见，不仅与其日益增长的知识结构相一致，并且与他的思想和人生观的演变保持一致。精神分析学，与其他任何科学分支一样，只能作为一种历史演变，而不能作为完善的知识系统来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与其创始人的个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如我们所见，弗洛伊德采取了精心措施来保护他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关于他早年生活的那部分。曾有两次，他销毁了他全部书信、笔记、日记和手稿。而这两次大清扫确确实实都是出于外部原因：一次是在他离开医院宿舍无家可归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当他彻底改变了他的住所布置。幸运的是，第二次销毁，即1907年的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那以后他开始仔细保存他的书信。关于第一次销毁文件的事，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风趣地写了如下的一段话；当时他才28岁（1885年4月28日）。

“我刚刚执行了一项决定，可能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残酷的，这是一群尚未降生的但注定不幸的人。既然你想不到我说的是谁，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是我的传记作者。我销毁了过去14年里我所有的日记、科学手记和出版物手稿。只有家庭信件留了下来。而你的信，亲爱的，当然毫无危险。所有的旧日友谊和交往的一幕幕又从我眼前划过，无声地走向死亡（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俄罗斯历史上）；我对整个世界的一切想法和感受，特别是世界如何看待我，都宣告了它们自身不值得被幸免。现在它们必须被重新思考了。我已经记下了很多。但是这些东西把我裹了起来，就像狮身人面像上面的沙土一样，很快我的鼻孔就会在一摞纸的上方出现。我不能离开这儿，在我死掉之前我得摆脱那些旧报纸带来的烦恼。除此之外，在我生命中决定性的突破之前，在我们走到一起和我召唤的选择之前，我将一切抛在脑后；它早已死去，不可否认那是一场光荣的葬礼。让传记作者气恼去吧；我们不会让他们的工作太轻松。让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正确理解了‘这位英雄的成长’：现在我甚至很乐意去想象他们是如何误入歧途的。”

弗洛伊德这场有趣的幻想伴随着轻快的嘲讽结论，在欣赏这段话的同时我们仍然敢于心怀希望，希望他最后的总结是一种夸张。

编写一本弗洛伊德传记的任务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数据如此庞杂，在它们当中你只能有一种选择——希望它是最有代表性的——并将其展示出来；在弗洛伊德发展的特定阶段，仍有充足的空间去进行深入研究。我最终还是选择接受这项使命的原因是，我们那个小圈子（委员会）中唯一一名还活着的人，与弗洛伊德保持长期的亲密联系，我和弗洛伊德是40年的老友了，也被称为所谓“精

神分析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弗洛伊德通往精神分析之路上的那些学科我也都十分熟悉——哲学，神经学，语言障碍，精神病理学，也是这个顺序——帮助我去追随他的前分析时代的成果，及其是如何过渡到分析阶段的。我是这个圈子里唯一的外国人，也许这个事实某种程度上给了我机会，比其他人更具客观性。我对弗洛伊德的人格和科学成就均抱有无限的倾慕和崇敬，我的英雄崇拜倾向在我遇到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弗洛伊德非凡的人格魅力——他性格上的突出特点——给他身边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为他绘制一幅远离人类的理想化肖像，则是我能想到的对弗洛伊德最为严重的亵渎。他对伟大的诉求，很大程度上仰赖他的诚实和勇气，他用对于他人来说是无价的一种方法，去克服内心的困境和情感冲突。